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二十編 第六冊

《國語》考校 ——以明本四種校勘條目為對象（上）

郭萬青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十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6冊

《國語》考校
——以明本四種校勘條目爲對象(上)

郭萬青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國語》考校——以明本四種校勘條目為對象（上）／郭萬青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104〕

序 2+ 目 2+19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十編；第 6 冊）

ISBN 978-986-404-087-2（精裝）

1. 國語 2. 校勘

011.08

103027398

ISBN-978-986-404-087-2



9 789864 040872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十編 第六冊

ISBN：978-986-404-087-2

《國語》考校——以明本四種校勘條目為對象（上）

作 者 郭萬青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編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二十編 24 冊（精裝）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國語》考校
——以明本四種校勘條目爲對象（上）

郭萬青 著

作者簡介

郭萬青（1975～），男，山東寧津人，副教授。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畢業，師從王志瑛教授；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畢業，師從方向東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文獻學、訓詁學、古漢語語法。在《文獻》、《敦煌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人文中國學報》、《東亞文獻研究》等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 60 餘篇，出版著作《〈國語〉動詞管窺》、《〈國語補音〉異文研究》、《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等 5 部，主持或參與國家、省級項目多項，曾獲全國高校古委會中國文獻學博士生三等獎學金、市社科一等獎等。

提 要

通過比對《國語》在明代的四種版本——正德十二年明德堂刊清人丁丙跋本、明嘉靖四年許宗魯宜靜書堂刊本、明嘉靖七年金李澤遠堂本和明萬曆六年童思泉刊本，以金李本為底本錄文，得出明本四種存在不同的條目 1333 條。以得出的 1333 條為校勘材料，再和慈利楚簡本、敦煌殘卷寫本以及宋刻宋元遞修本等傳世《國語》的諸多傳本、刻本和印本一一對照。本成果的主要內容如下：一、引言部分：探討《國語》的語料價值與史料價值、《國語》的流傳及其版本系統、《國語》的勘校和確立定本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等。二、主體部分：根據《國語》分卷順次對涉及到的 1333 條勘校條目進行文字、訓詁以及版本方面的探討。每一條勘校大體包括這樣幾個方面：（一）按照《國語》傳本的時代前後順序依次校錄各本的異文；根據《國語》各本異文的異同，初步判定《國語》各本之間的親緣關係。（二）比較異文，確定是非取捨。（三）對《國語》各本存在著的章目分合不同的問題，也在相關位置一一揭出，並且對於《國語》各本篇章分合的異同進行辨析。（四）惠棟和段玉裁、盧文弨等人的批校，也在相關條目之下一一引錄辨析。三、結語部分：（一）對以《國語》明本四種校勘形成的 1333 條為基礎的考校形成的《國語》異文問題進行整體總結。（二）通過異文勘校的梳理與總結，對《國語》分章問題進行全面總結與分析。（三）以 1333 條考校條目為基礎，進一步確定《國語》各本之間的關係。

自序

2003年9月，我在做了三年中學語文教師之後負笈桂林，從學於我的碩士生導師王志瑛教授，攻讀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王老師本科畢業於南京師範學院（今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受學於徐復老等諸位先生。王老師又於1979年考取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陳振寰教授的碩士生。陳振寰教授是王力先生的學生，副博士畢業之後到廣西師範大學工作。故王老師在受到章黃學派的訓練之外，復受王力語言學的訓練，在《楚辭》及屈賦語法研究方面有多篇重要論作。我從王老師問學之後，王老師在2003年底提起了一個研究計劃，即作「《國語》系列語言研究」計劃項目，並引導我進入《國語》專書的語言研究領域中。在王老師的指導下，我完成了《〈國語〉動詞語法試述》的碩士學位論文，畢業之後修訂成《〈國語〉動詞管窺》一書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碩士畢業之後，我也一直在王老師提起的研究規劃範圍內繼續做事情，涉及到《國語》的多方面問題，如《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國語補音〉異文研究》等以及與本書相關內容的一些研究成果等。當然這些研究還是羸淺和初步的。

2010年9月，我又在普通高校任教了四年之後負笈南京，隨從方老師問學，攻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方老師是徐老、錢老的及門弟子。很長時期以來，方老師又是徐老、錢老在南京師範大學的唯一傳人，高擎章黃的大纛，遊藝四部，尤以賈子之學與禮學最為學界所重，成果宏富。在方老師指導下，我較為系統地繼續對《國語》的相關信息進行搜集整理，並繼續以《國語》作為研究專題，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唐宋類書引〈國語〉研究》。

南京圖書館藏書宏富，早已聲隆宇內，其中庋藏《國語》各本信亦不少。然生性怠惰，雖在南京待了兩年多，竟未一往觀書。至於 2013 年 3 月份，心下想，再不去，則真入寶山而空回了，於是決定去。當然此前還有一個誘因，即賈繼用兄跑到南圖來替他的師姐查閱《鶴年詩集》，我就請孫曉磊同學一起去，意在短時間內可以校完。中間休息的時候，看到南圖有電子掃描版的丁丙八千卷樓藏配補本的金李本，丁丙的金李本原爲黃丕烈舊藏，還鈐有「士禮居藏」的印，所配補的是卷七至卷一四，用黃丕烈刊明道本，前六卷和後七卷皆爲金李本，且前六卷多有惠棟校語及校記，實爲惠棟校本，比《札記》所引既多且詳。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懶惰實在需要大批特批，遂萌到南圖看書之想。先把《四部叢刊》本《國語》複印作爲底本，帶複印件到南京圖書館，把黃丕烈舊藏本的校語一一逐錄。因爲是電腦上有的掃描件，不需要開證明即允許閱讀。後來打算儘量多看一些本子，於是請孫曉磊幫忙去文學院辦公室開了證明，於 2013 年 4 月 19 日到南圖看書，一直看到 2013 年 5 月 20 號，後來又斷斷續續看了一些時候。所觀者爲丁丙跋明明德堂正德十二年本、許宗魯本、童思泉本、李克家本、以及金李本原本等。凡有不同，一一記錄。

2013 年暑假期間，又把自己比對所得的條目錄入電腦，共得 1333 條。又旁參所能找到的《國語》各本，輔以語言文字學典籍及相關研究成果，詳加比勘，辨明甲乙，並爲按斷。相信對於漢字字形、異體字研究、《國語》版本系統、《國語》訓詁、《國語》文本的釐定以及《國語》的全面整理與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義。

清人汪遠孫於《國語》用功頗深，撰爲《國語校注本三種》，其中校理的部分名爲《國語明道本攷異》。今書稿撰成，亦務於校理，故名之爲《國語考校——以明本四種比勘條目爲對象》。當然，由於個人的水平有限，錯訛武斷之處在所難免，祈請四方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歲在癸巳孟冬丁亥火盆陳邨人識於麥望館



目

次

上 冊

自 序	1
引 言	1
國語解敘	23
周語上第一	31
周語中第二	63
周語下第三	81
魯語上第四	111
魯語下第五	129
齊語第六	147
晉語第七	173

下 冊

晉語第八	191
晉語第九	205
晉語第十	211
晉語第十一	237
晉語第十二	245
晉語第十三	253
晉語第十四	261
晉語第十五	273
鄭語第十六	281
楚語上第十七	295
楚語下第十八	309
吳語第十九	321
越語上第二十	343
越語下第二十一	347
結 語	355
主要參考文獻	367

引言

一、漢語史語料的校勘和《國語》本文形式的確定

漢語史的構建大約主要靠兩個方面的工作完成，一個是斷代研究，一個是專書研究。實際上斷代研究也往往建立在專書研究的基礎上。因此，專書語言研究在漢語史構建中就顯得尤其重要。郭錫良教授說：「古漢語語法專書研究是建立漢語斷代語法和漢語語法發展史的可靠基礎。」〔註1〕把郭錫良論述中的「語法」換成「語言」照樣合適。何樂士（1930～2007）教授也在《專書語法研究的幾點體會》一文中談到了專書語言研究尤其是語法研究的重要意義，她認為：（1）專書語法研究是漢語史研究的基石；（2）專書語法研究是專題語法研究的重要依據；（3）專書研究是比較研究的必要條件；（4）專書研究是建立新的理論的一個重要途徑；（5）專書語法研究的成果是檢驗自己或前人成說的有力武器〔註2〕。何樂士教授是大陸專書語法研究和專書語言研究的較早踐行者和《左傳》語言研究的重要專家，由於其個人專書研究實踐宏深，故而所談也更為深入而系統。

也正如郭錫良教授所說：「專書語法研究是一個全面鍛煉的過程，也是一個全面積累經驗、全面積累科研素材的過程。從專書的整理開始，版本、校勘、標點、今譯，這是前期的準備工作。」〔註3〕為什麼要做這個前期準備

〔註1〕 郭錫良：《古漢語專書語法研究漫談》，見載於氏著《漢語史論集》（增補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頁307～310。

〔註2〕 何樂士：《專書語法研究的幾點體會》，見載於氏著《古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頁360～384。

〔註3〕 同上。

工作呢？金啓華（1919～2011）教授云：「由於古代書寫工具的不同，從簡帛、銅器、甲骨、紙張、抄寫、排版等方面的變遷，古書中確有很多錯簡、漏刻、讀法等的不同或訛誤。因此，異文本的出現，則讀它必須求真避誤，具有判斷力。」〔註4〕就漢語史研究而言，漢語史的研究對象——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都是漢語史語料。由於文字字形的變遷、抄寫者的個人差異、各個時代的避諱以及相關問題，所有的漢語史語料都需要釐定，即在比較版本異同的基礎上確定最符合該語料文本的文本形式。關於這一點，張以仁（1930～2009）教授在其論文《訓詁學的舊業與新猷》中也進行過闡述，他說：

古人早已化為塵土，他們沒有留下錄音帶或留聲片。我們所面對的材料完全是文字的記錄，因此，有些屬於文字方面的問題便產生了。譬如材料的甄別問題、字體的結構問題、乃至文字的假借問題等。

材料的甄別，包括校勘與考證兩方面。古籍流傳，屢經翻刻傳鈔，編合抽離，常常造成各種各樣的錯誤，有時和語言毫無關係。如果沒有一番甄別整理的工夫，不僅可能導致結論的偏失，往往還鬧笑話。前賢討論古語古義，往往校勘、訓詁間雜而出，不是沒有原因的；古籍流傳，譌亂而外，又有偽作。有的是故意作偽，有的是後人誤認作時、作者，這種地方，如果沒有考證的工夫，勢必造成整個語義演變系統的絮亂。辨識字句的訛誤、資料的真偽，自然便要涉及校勘之學、考據之學。這種材料的甄別工夫，事實上也是一切學問的基礎，不僅是訓詁學而已。〔註5〕

張氏的話，比郭的更為具體，已經為漢語史語料的前期研究提出了基本的範式、方法等等。

當然，這裏面有一個怎麼來看待「最符合該語料文本」的問題。古典文獻學的主要任務是復原存真，這也是進行古籍版本校勘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原」和「真」的標準究竟如何確定？距離今天越久遠的古籍，這個問題就愈難處理。因為有些古籍是春秋時期就已經存在著的，首先要根據漢字史

〔註4〕 金啓華：《〈後讀書雜誌〉讀後》，《文教資料》1997年第4期，頁133～134。

〔註5〕 張以仁：《訓詁學的舊業與新猷》，見載於《張以仁語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頁5～14。

的研究來確定當時的文字應用的實際面貌，在這個基礎上纔能去談「復原存真」。可是即便是這個「原」、「真」按照我們今天對春秋時期文字應用的實際面貌確立了，是否真正能夠還原該書在春秋時期的實際面貌恐怕也還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今天掌握的春秋時期的文字應用的實際情形是經歷了歷代篩選之後留下來的，即便我們有比較多的出土文字材料作為參照，恐怕也還稱不上完備。另外，文字不斷增多，文獻迭經傳抄，後世閱讀的文本也是經過一次次傳抄過的文本，不可能是該書的早期形式。如果要研究該書在魏晉隋唐的情形，是否也還要根據這個時期的文字應用狀況進行復原，但是這個時期的復原就更不容易去做。古籍的流傳中文字的改易只是就一定程度上而言，古籍的大部分內容以及古人傳抄刊刻古籍很大程度上也還力求保留本來面目。因此，「復原存真」的標準也還值得進一步討論。不管其標準如何，最終的結果如何，漢語史語料總要進行一番整理，纔能做為研究語料進行漢語史研究，這是毫無疑義的。典籍的文本形式確定實際上到版刻較為發展之後纔實現。這一期間許多典籍都有了不止一種版本，而且版本之間因為種種的原因會存在不同，這些不同可能並不牽涉上述「復原」問題，但是也給語料的定性、定量以及相關研究帶來了一些麻煩，確實需要釐清確定。因此，把這一步工作做好也是相當重要的。這也是目前漢語史語料尤其是先秦兩漢語料所面臨的比較重要的問題和在進行語言研究之前有必要進行的一番工作。

《國語》作為一部先秦時期的語料和史料文本，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即定字（定形、定音、定量、定序）、定義以及時代或地域的確定。就《國語》而言，其文本的確定性需要《國語》各個傳本以及相關材料的勘正和具體語義的探討。筆者認為，《國語》文本形式的確定以及語義探討需要藉助四個方面材料：（1）出土的《國語》文本和傳世《國語》各個版本的校勘；（2）歷代《國語》研究著作的梳理與研究；（3）羣書引《國語》資料的整理與研究；（4）先秦兩漢其他典籍包括相關時期的出土文獻與《國語》同內容篇章或語段的比對與研究。

總之，《國語》文本的確定是《國語》語言研究和《國語》相關研究能夠開展的首要前提。而《國語》版本異文的梳理與清理是確定《國語》文本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國語》的版本系統及其問題

此處所用版本為「版本」的泛化概念。從版刻出現的年代角度而言，可以首先把《國語》的版本系統分為版刻前時代和版刻時代兩大類別。其中版刻前時代即在雕版印刷術產生之前《國語》的流傳情況。

（一）版刻前時代的《國語》傳本

目前可知的版刻前時代的《國語》傳本包括慈利竹簡本、肩金吾漢簡本和敦煌殘卷本三種。

慈利竹簡本是目前所見的《國語》傳本中最早的文本。該簡出土於 1987 年，時共出土 4371 件，較完整的簡大約存字二萬多。其中《吳語》部分大約存有 300 字左右。根據蕭毅研究的材料，一共 307 個字，包括語句中本來有字而脫漏的 27 個字，實際上實有字數為 280 字。慈利竹簡本是目前存世最早的《國語》傳世殘本。

此後一段時間內的《國語》傳本，目前可見的則為肩金吾漢簡本。此本目前所見者只有 12 個字，估計是其他典籍中的引文，也或者是《國語》殘簡。肩金吾漢簡本的字數更少，對於今傳《國語》文本很難談到價值。

此後可見的傳本為今甘肅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殘卷寫本。此本為《周語下》部分內容，包括正文 802 字，注文 1081 字。該本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就有蘇鑒輝的研究文章，此後饒宗頤、王利器（1911～1998）都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張以仁、陳鴻森的論文中也都涉及到該殘卷。後來拙稿《甘肅藏敦煌殘卷寫本〈國語·周語下〉校記》〔註 6〕即在參照上述幾家說法的基礎上，參照今傳本《國語》多本進行勘校疏理。這個寫本的價值具有以下幾個方面：（一）用以與今傳《國語》各本比勘；（二）豐富了《國語》舊注的內容；（三）為韋注的比較研究提供了參照。

這是版刻產生之前《國語》傳本的基本情況。

（二）版刻時代的《國語》傳本

版刻時代的《國語》傳本由於分類標準不同，故而系統類別亦不相同。

〔註 6〕拙稿《甘肅藏敦煌殘卷寫本〈國語·周語下〉校記》，《敦煌研究》2009 年第 3 期，頁 63～72。又經增訂附錄於拙著《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之後，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4 年版，頁 359～399。

如果從寫本與刻本的角度而言，則版刻時代的《國語》傳本可以分爲寫本和刻本。寫本主要爲清代四庫館臣編纂的《四庫全書》系列本，現在比較容易見到的爲《攤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文淵閣四庫全書》和《文津閣四庫全書》等三種叢書中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因存世不全，至於是否尚有《國語》，因沒有詳細調查過，不可得知。此外，中國大陸的甘肅省還存有一部《文溯閣四庫全書》，正在動議影印中，至於其詳，亦不可得知。刻本則從宋代開始一直到晚清，代不乏精刻本。其中刻本又可以分爲活字本和雕版刻本兩種。活字本目前所見唯有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朝鮮活字本《國語》，這個本子是明道本在明早期的傳本，可藉以與黃刊明道本相比勘，發現並解決黃刊明道本的諸多問題。另外還有朝鮮哲宗十年（咸豐九年）活字本，從著錄資料看，該本當是覆刻張一鯤本之本，因只見著錄資料，具體情況尚不知道。此外就是雕版刻本，包括今存最早的宋刻宋元遞修本以至於清末的寶善堂重刻明道本等。

如果從版本系統的角度而言，則包括兩大版本系統，即公序本和明道本。明道本的版本系統比較單純，包括活字本、抄本和雕版刻本，活字本即上所言朝鮮活字本，抄本即毛鈔本和錢抄本，刻本即黃丕烈（1763～1825）讀未見書齋本以及後來的覆刻本、重刻本等，覆刻本如崇文書局刻本、永康退補齋刻本、蜚英館石印本、博古齋石印本、掃葉山房石印本、錦章書局本、會文堂本、鴻寶齋本等，重刻本則爲光緒乙未（1895）寶善堂刻本。抄本目前無緣得見，而且其中錢鈔本的下落不明，毛鈔本則經由陸心源（1834～1894）的皕宋樓舶載而東，藏在日本靜嘉堂文庫。日本學者河田巖（1842～1920）編訂的《靜嘉堂秘籍志》對毛鈔本有著錄。

公序本的版本系統則相對較爲複雜一些。從文本內容上看，可以分爲韋注本、韋注補音合刊本、白文本、評注本、選本或刪注本、注疏本等，韋注本包括弘治本、許宗魯本、金李本、詩禮堂本、《四庫全書薈要》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等；韋注補音合刊本分爲兩類，其一爲《補音》附於《國語》之後，如宋刻宋元遞修本、明德堂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等，其一爲《補音》散入《國語》正文各相應位置，如張一鯤本、綠蔭堂本、文盛堂本、成文堂本、朝鮮哲宗十年本等；白文本目前所見刊本中只有吳勉學本一種；評注本則包括穆文熙評本及其系列版本，如《國語評苑》、道春點本、千葉玄之本、秦鼎本、高木熊三郎本等；

選本或刪注本則包括百家類纂本、二乙堂本、《國語鈔評》、閔齊伋本、孫琮本、高嶧本等；注疏本只有一種，即董增齡《國語正義》。從版本形態上，可以分為鈔本和雕版刻本和活字刻本，抄本則唯《四庫全書薈要》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其他皆為雕版刻本和活字刻本。如果從版本系統上進行分類，則可以分為遞修本、明德堂本、張一鯤本、《四庫全書》本等子系統。明德堂本下可以有許宗魯本、金李本、童思泉本、詩禮堂本、《國語鈔評》等；張一鯤本下則可以分為張一鯤本及其覆刻本、穆文熙《國語評苑》等，穆文熙《國語評苑》下又可以分為穆文熙《國語評苑》及其覆刻本、道春點本、千葉玄之校本、秦鼎本、高木熊三郎標注定本等；《四庫全書》本下則包括《四庫全書薈要》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及其他幾大閣的本子，由於我們目前只能看到《四庫全書薈要》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故所談到的《四庫全書》本也只對這三個本子而言。

（三）《國語》版本方面的諸多問題

就版刻時代的《國語》版本系統而言，是單純的。但是就《國語》各本之間的前後承襲關係而言，則問題比較複雜。首先，今傳遞修本和明道本之間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包括許本也存在著這樣的現象。那麼就有一個早期公序本、公序本和明道本之外的其他《國語》各本、明道本的前後承襲問題；其次，公序本內部各本的關係問題。如果籠統地分類，我們可以提出幾個關鍵人物，比如宋庠（996～1066）、許宗魯（1490～1559）、張一鯤、穆文熙（1532～1617）、秦鼎（1761～1831）。但是就今天是否有真正的宋庠校本存在這一點而言，我們是不敢下肯定結論的，至少從現存最早的遞修本上還無法做出這一推斷。第三，各國語之後首錄《補音》對各國的解釋。此前一直以爲是張一鯤本開其端緒，後來看到許宗魯本，以爲是許宗魯本，後來看到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朝鮮活字本，纔知道在明正統年間（1436～1449）已有此例，而且活字本是目前可見的最早把《補音》各條散入韋注中的本子。以前是否還有？難以得知。當然從所參據到的《國語》傳本上，我們知道以活字本爲最早，而且活字本是明道本系統。而在中國本土，直到沈鎔（1886～1949）的《國語詳注》，纔借鑒到公序本的這種方式；第四，穆文熙《國語評苑》雖然以張一鯤本爲底本，但恐怕其細端也還不同；道春點本和千葉玄

之本肯定不同，道春點本和穆文熙《國語評苑》也肯定不完全相同，借鑒了黃刊明道本的秦鼎本和千葉玄之本就更有諸多不同之處；明清的公序本中，詩禮堂本存有康熙間印本和乾隆丙戌（1766）印本的區別，這兩次印本不完全相同，即便同署為乾隆丙戌刊刻的詩禮堂本各本也還存在差別。《四庫全書》本中的《四庫全書薈要》本開公序本借鑒明道本優長之處的先河，但是《四庫全書》本各本之間吸納明道本以及其他《國語》版本成分多少並不相同，以《四庫全書薈要》本吸納最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次之，比如公序本系統中《周語上》「昔我先世后稷」，薈要本根據明道本改作「昔我先王世后稷」，校勘記云：「謹案：卷一第二頁前一行『昔我先王世后稷』，刊本脫『王』字，據宋本增。」〔註 7〕文淵閣本從薈要本增「王」字，文津閣本則仍保持公序本原貌，可見四庫本各本之間也並不相同。故而《四庫全書薈要》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國語》文本和詩禮堂本也存在著諸多不同。又活字本「經筵所藏《國語》與《音義》一本」中的《音義》和《補音》究竟是什麼關係？凡此，仍然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三、所參據《國語》各本情況

拙著《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已經利用到了《國語》的一些版本，至於《〈國語補音〉異文研究》與《隋唐類書引〈國語〉研究》〔註 8〕，所用《國語》版本比《小學要籍引〈國語〉研究》更多，而且《〈國語補音〉異文研究》引言對於所參《國語》各本以及關係做了較為詳盡的考證和說明。此次校證所及《國語》版本又增加不少。今仍然按照時代和版本順序做一下說明，為便於行文，前列簡稱。

（一）遞修本。此為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6 年出版的中華善本再造工程第二輯影印的本子。為南宋初期刊刻、南宋中期和元代進行過補修的本子。是目前存世最完整的、最早的《國語》本子。《〈國語補音〉異文研究》引言中對該本有比較詳盡的考辨，可參彼文，此處不贅。

〔註 7〕（吳）韋昭注：《國語》，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攤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 203 冊，頁 27 上。

〔註 8〕拙著《〈國語補音〉異文研究》，臺北：蘭臺出版社 2013 年版。拙稿《唐宋類書引〈國語〉研究》，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2013 年。

(二) 活字本。該本為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為朝鮮活字本，刊刻年代不詳。全書總共 6 冊，第一冊為周語上、中，第二冊為周語下與魯語，第三冊為齊語至晉語三，第四冊為晉語四至晉語六，第五冊為晉語七至楚語上，第六冊為楚語下至越語下。全書內容順次為韋昭《國語解敘》、宋庠《國語補音敘錄》、《國語》目錄、《國語》正文。半頁 10 行，行 17 字，注文小字雙行。第六冊最後有「圓光寺常住」墨筆題記，每一冊終卷之後皆有「圓光禪寺藏書」章。在《敘錄》之後、目錄之前單起一頁有題記一篇，交待本書刊刻原始，共 8 行，行 14 字，共計 112 字。如下：「經筵所藏《國語》與《音義》一本，頗有脫落。求之中國，得別本，闕逸尚多，註解亦畧。購求日本，又得詳、畧二本兼《補音》三卷以來，亦且不完。正統庚申夏，命集賢殿以經筵所藏舊本為主，參考諸本，正其訛謬，補其脫落，仍將《音義》、《補音》芟蕘煩亂，分入逐節之下。其不完者，韻書補之。於是為書遂全云。」從該段文字知道該書始校於正統庚申（1440），既以經筵所藏為底本，則說明該本的基本面貌還是朝鮮經筵舊藏，則時代更古。或可以見出明道本在明代早期甚至更早時期的流傳。但是這個活字本是以經筵所藏本為底本、參校中國「別本」和「日本詳、畧二本兼《補音》三卷」的基礎上刻成的。雖然是明道本的早期版本，實際上已不純正，運用它來考訂明道本《國語》的問題時需要謹慎。

(三) 丁跋本。為清丁丙跋本，此本實為明正德十二年（1517）明德堂刻本。在南圖所看為膠片，著錄號為 GJ/110217，原件著錄號為 110220，著錄信息為：《國語》二十一卷，（吳）韋昭注，《補音》三卷，（宋）宋庠撰。明刻本，清丁丙跋，四冊，卷一至卷五為一冊，卷六至卷十一為一冊，卷十二至卷二十一為一冊，《補音》為一冊。其中有浮簽，云為明刊大字本，並謂「殆明正德口口宋刻本也」，各卷均有不同程度闕頁，《補音》三卷闕越語部分。每卷首作「×語×第× 韋氏解」，其刻字用字亦頗參差。《國語解敘》半面十行，行二十字。與金李本格式全同。然頗多俗字。

(四) 許宗魯本。為許宗魯嘉靖四年（1525）宜靜書堂刻本。許宗魯（1490～1559），字伯誠，又字東侯，號少華。明過庭訓（？～1628）《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百四載其事頗詳，云許宗魯為陝西咸寧人。許宗魯作字「精詣古法」，所以其所刻古籍用篆書直接楷化字，這也是其所刻《國語》的一個特點。南京圖書館藏有兩部明許宗魯宜靜書堂刻本《國語》，一部為十

冊裝縮微膠片本，另一部爲四冊裝（許宗魯所刻《國語》，審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許氏宜靜書堂刻本《國語》一部，亦 10 冊，與南圖藏本同。《天祿琳琅書目續編》著錄爲二函 16 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著錄爲 8 冊）。四冊裝者唯卷一首頁版心下有「宜靜書堂」四字，而十冊裝本則每頁版心下皆有「宜靜書堂」四字。並非如葉德輝所述作「宜靜書屋」。該本每半頁十行，行 20 字，少數行 19 字、21 字、22 字不等。依次爲韋昭《國語解序》、宋庠《國語補音序》、《國語》諸家名氏、諸國世系表、目錄、古文音釋、國語正文。宋庠（996～1066）《國語補音敘錄》文中本列有漢以來各家《國語》注解大略，許氏則從宋庠《敘錄》中刪去，把《國語》注家諸家名氏單列於後。但其所列諸家名氏有誤，如「左傳三十篇」，許本誤爲「三十一篇」；又「春秋外傳國語章句二十一卷」，許本誤爲「一卷」。又許氏在《諸國世系表》後面加案語云：「按《補音》所載諸國世系凡例不一，若無統紀。今祖春秋世系圖類書於首，以便觀者。」但是以許氏《諸國世系表》和《補音》各語卷首諸國注解對照，則二者實無二致，唯許氏將散見八處之文輯合於一處而已。《國語古文音釋》爲王鏊所撰。《音釋》最末有王氏識語云：「予許子刻《國語》成，授鏊復校。三豕既去，六書惟故，學士采焉。然童子授讀，尙迷心目。因校，隨筆以備遺忘，校終，得字凡五百有奇，命曰《國語古文音釋》，附於首卷，以便初學。凡直注者，本文也；凡稱『同』者，通用也；凡稱『音』者，音同義異也；凡稱『異』者，文各見而義亦異也。閩中王鏊謹識。」就整體上而言，王氏《古文音釋》專爲許氏所刻《國語》而作，並無獨立性，也很難談到學術價值。又見臺灣「國家圖書館」古籍影像檢索系統中所收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許宗魯本有許宗魯《刻國語序》一篇，末署「□□□□月朔咸寧許宗魯伯誠父謹序」，序文所在書頁稍有殘損。許氏《刻國語序》將近 490 字，臚舉監本、閩本、大名本之失並詳述《國語》的價值。前在南京圖書館所見膠片本的許宗魯本兩種皆無《刻國語序》一篇，審丁丙《八千卷樓藏書目》載述許宗魯本《國語》亦不云許本前有《刻國語序》一篇，可見許本也非刻過兩次，至少也有三次以上的刊刻。

（五）金李本。爲明嘉靖七年（1528）金李澤遠堂刻本。金李資料所見甚少，生平不詳。吳梅（1884～1939）《瞿安日記》卷一「舊曆辛未九月初五」下云：「述古舊鈔《廣卓異錄》、元本《杜工部集》（爲吳門金李舊藏。金字稚